

# 城市新区作为“家”的表征与实践 ——以鄂尔多斯康巴什新区为例

尹 铎, 钱俊希, 朱 竑\*

(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 文化产业与文化地理研究中心, 广州 510631)

**摘 要:**本文基于表征与非表征的研究视角,分析了以鄂尔多斯康巴什为代表的中国城市新区作为“家”的表征与实践过程。研究发现:针对康巴什新区,外部媒介与地方政府以表征手段建构了截然不同的“家”的意象。其中,BBC、Times等外媒将康巴什新区描绘成充满荒凉景观的“鬼城”和不健康的中国城市居住空间,而在地方政府的重构中,康巴什新区则充满了生态栖居必备的城市景观并成为了先进的城市文化空间。而作为“家”中的居住者,康巴什居民“家”的营建经历了从陌生到认同的渐进过程,这一过程包含了日常生活实践中的空间转换与情感边界的构建。不同行动者共同塑造了康巴什新区多元的、充满矛盾意义的“家”的空间身份。本文旨在丰富中国快速城市化背景下“家”的地理学研究视角与类型,回应“鬼城”话语对地方政府主导的城市化“无家”的质疑,亦是城市新区社会文化研究的有益拓展与补充。

**关 键 词:**城市新区;“鬼城”及家;表征;非表征;鄂尔多斯康巴什新区

## 1 引言

家是人文地理学重要且新颖的研究话题(封丹等, 2015)。在1970-1980年代人文主义地理学者的研究中,家是真实性与体验性的场所,能为情感疏离的社会提供充满人情味的归属感(Moore, 2000)。随即,家成为拥有愉悦、舒适等积极属性的象征。但随着城市社会学、形态学等更多学科的介入,这一将家视为温暖与和谐港湾的观点在1990年代遭遇了旗帜鲜明的对立方。曾经只流露正面情感的家出现了内部与外部、私人与公共等二元对立的观点(Brickell, 2012)。家所象征的情感也出现了斗争与反抗等消极意义(Badgett et al, 1999)。例如,美国城市绅士化对于新兴中产阶级来说是在营建更高品位的“家园”,而对城市的流浪者等边缘群体

来说却是被迫离开“家园”的过程(Reid et al, 1993)。面对争论,学者们越来越发现,家实际上是不同主体持续建构、改变与协商的一个过程产物。因此,既要关注家给予人们的宽慰、鼓励与希望,也需要关注家中的失望、恶化与冷漠(Brickell, 2012)。

伴随着全球化与城市化进程,从1990年代各种功能类型开发区蓬勃发展,到21世纪大规模综合型城市新区持续得到开发,中国城市新区的建设浪潮此起彼伏(朱孟珏等, 2013)。就物质性而言,城市新区作为生产生活的重要拓展场所,是社会经济及其结构转变的具体表现(刘云刚等, 2010),是城市区域整体中新兴且重要的家空间。就情感象征性而言,城市新区理应作为居民的“家园”与“家乡”而存在。另外,城市新区的建设是时间发展与空间推进的产物,在政府实现土地增值与房地产商实现经

收稿日期:2016-07;修订日期:2016-10。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41630635);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401139, 41301139);国家旅游局“万名旅游英才计划”研究型人才培养项目(WMYC20151035) [Foundation: Key Program of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No.41630635;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No.41401139, No.41301139; The Research Oriented Talent Training Program of National Administration of China, No.WMYC20151035]。

作者简介:尹铎(1990-),男,内蒙古鄂尔多斯人,博士生,从事旅游地理与社会文化地理研究, E-mail: yinduo@m.scnu.edu.cn。

通讯作者:朱竑(1968-),男,甘肃临夏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文化地理研究, E-mail: zhuh@scnu.edu.cn。

引用格式:尹铎, 钱俊希, 朱竑. 2016. 城市新区作为“家”的表征与实践: 以鄂尔多斯康巴什新区为例[J]. 地理科学进展, 35(12): 1517-1528. [Yin D, Qian J X, Zhu H. 2016. The representation and practice of new urban district-as-home in China: A case study of Kangbashi New Town, Ordos[J]. Progress in Geography, 35(12): 1517-1528.]. DOI: 10.18306/dlkxjz.2016.12.008

营利润最大化愿望的驱动下(李郇等, 2006), 中国城市新区的建设与推进具有强烈鲜明的政治经济属性。城市新区要成为居民的“家”, 就必须经历政府、市场与居民等不同行动者持续地互动过程。因此, 城市新区的发展建设问题亦是一个“家”的地理学问题。

近年来, 在城市新区的建设过程中, 大量媒体开始给一些中国城市新区贴上“鬼城”的地理标签, 这些所谓的“鬼城”被认为是“无家”(unhomely)的地方, 且往往具有2个显著的特征: ①人烟稀少, 甚至被描述为城区没有生命的迹象; ②充满了快速城市化导致的空置住宅与基础设施。鄂尔多斯康巴什、郑州郑东、十堰、常州以及昆明呈贡等大量尚在建设或需要进一步发展的城市新区被塑造为“鬼城”典范, 人们对寻找与发现“鬼城”乐此不疲, 甚至于发布中国内地“鬼城”地图, 建构指标体系进行“鬼城”排名。

中国城市新区逐渐成为令人迷惑的地方, “鬼城”的地理标签与受众想象紧紧地纠缠在一起。鉴于此, 若不引起足够的重视, 中国城市新区就会逐渐形成固化不健康的居住空间形象, 似乎地方只要发展新区就可能会引发民众质疑。外媒所渲染的“无家”往往是根据中国城市新区在发展建设前期的物质性与局限性而定义的, 而对于地方居民而言, 这种基于前期物质性所呈现的“无家”特征也是入住新区后必须面对的。伴随着城市新区的发展建设与居民日常生活不断地、重复地人地互动, 居民对于先期物质性“无家”的协商机制以及情感意义上的“家”的体验过程尚待深入发掘与探讨。因此, 本文选取中国城市新区中最富话题性的鄂尔多斯康巴什新区为案例, 以批判的视角, 关注现今“鬼城”话语对地方政府主导城市化“无家”的质疑, 辩证、发展地分析城市新区“家”的身份, 以期丰富中国快速城市化背景下“家”的地理学研究视角, 同时对城市新区的社会文化研究也是有益地拓展与补充。

## 2 理论背景与文献回顾

当前以“家”的地理学为研究棱镜对城市空间进行关注的研究, 主要集中于表征与非表征2种视角(Blunt, 2005)。表征主要关注抽象化的符号之中与城市中的“家”相接合的文化、政治与经济因素及

其历史背景(Walters et al, 2015), 而非表征则重点关注“家”中不可符号化的情感、知觉与行为等具象化的空间要素(Power, 2008)。表征与非表征将“家”所呈现的物质性与象征性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两者是认识论与本体论范式下对空间的不同探讨, 两者一致抑或矛盾的解读恰是“家”的意义统一与矛盾的集中体现。因此, 为了系统阐释城市新区“家”身份的多元化呈现, 本文分别从表征与非表征2个方面出发, 分析不同主体对康巴什的表征与实践, 试图更加全面地展示城市新区“家”的空间性与政治性, 为康巴什新区等中国城市新区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 2.1 表征与建构中的家

表征(representation)是指通过符号来生产意义的人类行为(斯图尔特·霍尔, 2003), 文本作为重要的符号, 通过语言代码系统与视觉代码系统被赋予了承载建构意义的使命(Burton, 2005)。在此框架下, 语言代码系统通常利用字母、词汇与句式(包括口语与书面语)表达内涵, 而视觉代码系统则通过颜色、角度、图像与叙事手法建构意义。因此, 运用文本的过程成为了通过代码系统表征他者、景观与地方的过程, 文本表征的意识形态意义开始远超过其物质本身(Dittmer, 2010)。这种后结构主义意识形态在1970年代后的人文地理学中颇为流行, 人文地理学者通过对文本中的地理知识进行分析, 解码其表征的社会群体及其社会语境, 反思表征过程中所显现的权力关系(李樊等, 2008; 安宁等, 2015)。作为人文地理学的重要分支, “家”的地理学同样也将文本作为研究工具对“家”展开表征与建构。Blunt等(2006)在其经典著作《家》(home)中强调文本对表征“家”所具有的重要作用。实证研究中, 瑞典居家生活指南《家中的一切》(Allt i Hemmet)将具有倾向性的价值观、概念与规训嵌入文字, 将其作为文本持续地从物质性与非物质性2个维度显示出乡村小屋纯洁、自然与亲切的气质, 最终古老陈旧的乡村小屋成为了瑞典乡村艺术品与国家文化符号的表征(Lagerqvist, 2014)。相反地现代崭新的乡村小屋由于杂志《新西兰之家》(Home New Zealand)的价值导向所需, 却被描绘成为在新西兰进行第二居所奢侈消费与奢靡生活的具象表征(Walters et al, 2015)。

此外, 对英国南亚家庭的研究表明, 陈列的照片、摆件与图画作为文本景观(textural landscapes)所

表征的意义与价值远超其文本本身,在日常生活空间中的感知与阅读对于塑造南亚家庭的归属感至关重要(Tolia-Kelly, 2004)。总之,“家”在塑造文本的内容同时,文本也在建构着“家”的意义。通过解读文本,可以了解“作者”书写文本的语境、倾向与意图,揭示各种由权力和意识形态所支配的“家”的营建过程与方法,对解释“家”的空间性与政治性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 2.2 非表征的家

由于表征与建构思潮的流行,使得人文地理学者忽视了许多基于日常生活的“主观能动性”与“亲密度”,研究缺乏对于空间即时性与连续性的关注。Lorimer(2005)认为,对于文本中表征的空间意象与意义,许多能创造空间意义的“事物”都与人对空间直接地、动态地体验有关,并不能间接地被表征与建构。非表征理论(non-representational theory, NRT)就是这种排除表征思想中最具代表的理论之一。这一理论被用于挑战表征与建构主义,其创立者Thrift认为,意义更多地是由直接的、即时的空间体验生产,并非是通过反思(reflection)、抽象(abstraction)、翻译(translation)与表征(Thrift, 1996, 2008)。这些直接的空间体验包含展示、实践、日常生活琐事、情感与身体等维度(Cadman, 2009)。与倡导表征对挖掘文本背后的权力运作的机制与意义不同,非表征理论的目标并不是寻求现象的理论化,而是尽可能地与具象空间中的地理情境相融合,呈现其中的日常生活(Andrews et al, 2015)。在“家”的地理研究中,非表征维度通常体现在实践与情感2个方面。首先,实践维度通过反映居民的日常话语与生活行为实现。例如,温哥华岛退休社区老年人正是通过邻里间的日常实践,如卸货时碰面的日常寒暄、遛狗时亲切地短暂交流、购物时店员

准确报上称呼而获得的贴心温暖等,使得家的意义超越微观尺度个人的家庭住宅而延展到了整个社区(Cloutier-Fisher et al, 2009)。而伴随着日常的阅读、踢球等休闲实践,公园、操场等公共空间亦成为了伦敦市青少年群体心中“犹如家一般”(home-like)的地方(Ahmet, 2013)。其次,伴随着人文地理学的“情感转向”,空间性、开放性与关系性的情感得以确立(朱竑等, 2015)。家本身是充满情感的地方,家庭内部的情感能够传达成员的感觉、意识与经验。家是通过身体的日常实践培育情感最好的空间载体(Morrison, 2012)。家庭成员会因为家空间的转换,家中物品与外界对家认同程度的改变而产生情感的变化与波动。因此,除了基于文本的表征与话语分析的方式之外,基于身体的体验与情感亦能从根植于生活的点滴之中营造出家的意义。

## 3 研究区概况与研究方法

### 3.1 研究区概况

鄂尔多斯市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西南部,全市辖7旗2区,总面积8.7万km<sup>2</sup>,总人口194.07万,其中蒙古族17.7万,是以煤炭、羊绒等闻名的资源型城市。康巴什是鄂尔多斯中南部的城市新区(图1),其从规划到成立经历了一系列的发展过程。在1990年代中国开发区建设最活跃的时期,鄂尔多斯市依托煤炭开采开始呈现出经济发展的超常规态势,经济的腾飞与城市整体竞争力的快速增长令全国乃至世界瞩目。东胜区是鄂尔多斯市最繁华的城区,亦是原市政府所在地,2000年底该区常住人口252566人,并以年平均8.72%的速度增长,2010年已达582544人,占鄂尔多斯常住人口的30%。为缓解人口增长与交通压力,2000年鄂尔多斯市政府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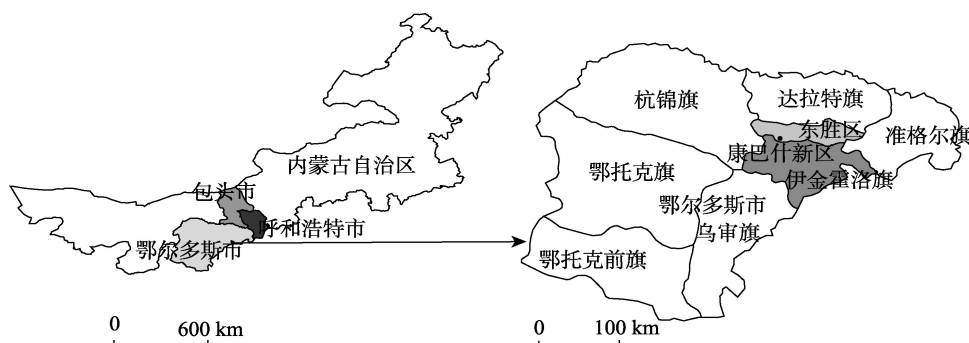


图1 康巴什新区区位图

Fig.1 Location of Kangbashi New Town in Ordos



定延伸城市核心区框架建设青春山开发区。2004年青春山开发区正式更名康巴什新区,2006年市政府整体搬迁入驻康巴什,康巴什进入快速发展阶段。目前,新区总面积352 km<sup>2</sup>,城市建成区面积32 km<sup>2</sup>,住宅小区由2011年的21个发展为2014年的59个,随着住宅数量增加,新区人口亦从2011年的10693人发展为2014年的49549人(不包括外来流动人口)。

作为中国城市新区建设浪潮下的产物以及传统矿产资源型城市“自上而下”城市化模式的典型代表,自2010年美国《时代》(Times)杂志报道之后,康巴什新区就成为中国城市新区的“鬼城”范本。2011年与2012年鄂尔多斯市遇到民间借贷危机与煤炭经济下滑带来的双重压力,随之而来的“经济疲软”“城建乏力”等描述更使围绕康巴什新区的话题与争议至今都未曾停歇,而诸多争议背后所蕴含的权力关系以及生活在新区中居民真实的声音亟待有效传递。

3.2 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文本分析与实地调研相结合的方法。首先,文本资料搜集。第一部分资料选取对康巴什引发争议最大的2010年美国《时代》杂志与2012年英国广播公司新闻频道(BBC News)对康巴什的报道进行文本分析,结合其后国内新闻对康巴什的专题报道,共整理网络文本资料7万余字,将外界对康巴什“家”的建构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解读。第二部分是作为新区的管理者——政府对康巴什进行“家”的重塑。本文采用Pinkerton等(2014)的文本研究方法,以康巴什新区政府在中国最流行的三大新媒体——新浪微博、博客及微信官方公众号为对象,选取新浪博客“康巴什新区发布”创建以来至2015年8月13日的1306则历史消息为蓝本,结合康巴什新区政府在新浪微博与微信官方公众号的历史消息,排除了145则通知公告类普通政务服务信息,选择其中对康巴什新区“家”的建构相关的434则报道作为文本进行分析(其中新浪博客消息311则、博客消息42则、微信公众号消息81则)。

其次,对康巴什的实地调研与关注始于2012年初。由于“地方依恋”是形成“家”的关键元素,因此调研首先对居民的地方依恋感进行问卷测量。调查时间为2012年10月与2013年1月,共发放问卷540份,经严格筛选,回收有效问卷494份,有效率为91.5%。问卷采用五点李克特量表测量,1~5分别表示非常不同意、比较不同意、一般、比较同意、

非常同意。调研问卷数据显示,居民认为:“鄂尔多斯其他地方无法与康巴什相提并论”(平均分 $M=3.75$ )、“对康巴什的喜欢程度超过鄂尔多斯其他任何地方”( $M=3.62$ )、“康巴什令您为生活在鄂尔多斯感到骄傲与自豪”( $M=3.93$ )。总体来说,居民对康巴什显著地地方依恋( $M=3.73$ )使康巴什有可能成为其情感中心。在此基础上,2014年11月-2015年3月,调研人员在5个月内共10次赴康巴什调研,并于2015年7月2日-8月13日进行了43天的深入调研,参考问卷调研结果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并结合康巴什三大街道居民主体构成情况,共对20人(编号A-T)进行了深度访谈,与样本保持了良好的联系(表1)。为尽可能地将研究置入康巴什新区居民的日常生活情境,调研人员在2015年1月16-27日、8月4-13日进行了为期22天的体验式观察,观察居民聊天的日常话题与生活实践,力争更全面地把握居民在康巴什的日常生活与情感体验。

4 结果与分析

4.1 康巴什“家”的表征与建构

康巴什整体作为中观尺度的城市空间,其意象

表1 研究样本构成情况

Tab.1 The samples

编号	性别	年龄	居住时间	职业
A	女	45	出生至今	转移进城农牧民
B	男	52	出生至今	转移进城农牧民
C	男	31	4年	公务员
D	男	65	出生至今	转移进城农牧民
E	男	30	5年	公务员
F	女	29	2年	公司职员
J	女	54	2年	中学教师
H	男	37	>20年	转移进城农牧民
I	男	40	5年	个体老板
G	女	28	4年	教师
K	男	45	6年	公务员
L	女	37	>10年	转移进城农牧民
M	男	32	1年	中学教师
N	女	46	出生至今	转移进城农牧民
O	男	32	4年	个体老板
P	女	50	出生至今	转移进城农牧民
Q	女	26	半年	小学教师
R	男	60	出生至今	农牧民
S	男	59	出生至今	农牧民
T	女	54	出生至今	农牧民

最初由外部媒介所提供,而后经过政府的解读与重塑呈现在公众面前。因此,本文关注外部媒介、政府2个主体如何从物质与情感2个方面建构与重塑出康巴什“家”的意义。

#### 4.1.1 新区外部媒介对康巴什“无家”的书写

外部媒介作为康巴什新区“家门外”的旁观者,选择对地理现实单一片面地转录与解读,以想象的方式运用文本对康巴什的身份与意象进行表征。面对中国城市新区的建设浪潮,由于英美国家城市发展的方向已由向外扩展转向回归内城,随着资源回流,城市普遍缺乏空间拓展,因此他们认为康巴什新区建设快速推进是中国城市化过度、跃进式发展的结果。这一想象在美国《时代》杂志与BBC新闻频道对康巴什的报道中被展现得淋漓尽致。

美国《时代》杂志与BBC新闻频道的记者似乎并不关心康巴什尚处于建设过程之中的事实,而是极具倾向性地挑选他们“感兴趣”的物质景观进行书写与拍摄,从物质上建构了康巴什荒凉凋敝的“无家”意象。如《时代》杂志就直言不讳地描述:“新区……现实几乎没有人住在那里……仅有少数政府办公室开放,那些偶尔出现在人行道上的行人,也犹如恐怖灾难电影中的幸存者一样稀少……”。BBC新闻频道在“鄂尔多斯:中国最大的鬼城”的报道中亦陈述了如出一辙的景观:到处是卖不出去的住宅、未出租的商铺与空置的办公楼。”搭配文字的书写,2篇报道共展示了15幅图片。这些图片均使用灰色、黑色等昏暗色调进行处理(图2<sup>①</sup>),只有一副出现了行人,其余全部为还未建成的城市

“烂尾楼”(其实是冬季停工期的工地场景),米歇尔·福柯(1998)强调地理知识的产生与权力的运作具有紧密的联系。地理知识作为权力的表现形式与效应过程,为权力在空间中的运作提供了合法性基础(张梅等,2013)。西方媒介对康巴什的描写不仅是西方对于中国城市化建设浪潮想象的投影与判断,而且还反映了他们到访实地后刻意“捕捉”并希望更广大的受众中“分享”的想象概念。

虽然,空置楼盘等景观仅仅只是康巴什尚在建设中的状况,但在图片的倾向性“佐证”下,西方媒介对单一时间截面中康巴什片面的空间描写,还是被国内媒体与受众进行了非理性的情感消费,并将这种情绪网状地传递下去(Pain, 2009)。例如,“鄂尔多斯康巴什鬼城迷局:买件衣服还得跑20 km外”<sup>②</sup>,“康巴什,50亿元建设的内蒙古‘鬼城’”<sup>③</sup>,“鄂尔多斯康巴什巨大空城”<sup>④</sup>等专题新闻频现国内媒体报道,而受众在接受媒体信息的同时也开始作为主动的知识生产者对康巴什进行情感解读。例如,网民“流浪的蚂蚁”这样感慨:“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您用您的铁骑横扫了欧洲大陆,可曾想到不屑的子孙为了虚荣而将您的一世英名毁在了鬼城这片恐怖的土地上?”<sup>⑤</sup>。外部媒介发布的信息不断地被受众“邂逅”,而在“邂逅”的过程中地理意义又不断地被再生产(安宁等,2015)。在内外媒介的建构下,康巴什新区被描述为充满荒凉景观的“无家”地方,是被地方政府为主推地产经济而创造出来的畸形产物,充满了阴暗与荒凉,作为中国不健康的城市居住空间的象征。



图2 《时代》杂志展示的康巴什意象

Fig.2 The image of Kangbashi New Town constructed by "Times"

①图片来源:《时代》杂志 <http://content.time.com/time/photogallery/0,29307,1975397,00.html>。

②资料来源:东方早报网 <http://www.dfdaily.com/html/33/2011/3/1/574117.shtml>。

③资料来源:东北新闻网 <http://society.nen.com.cn/society/396/3474896.shtml>。

④资料来源:艺龙旅游指南 <http://trip.elong.com/news/n01fbseb.html>。

⑤资料来源:蚂蜂窝旅游网络社区 <http://www.mafengwo.cn/i/913624.html>。



#### 4.1.2 新区政府对康巴什“家”的重塑

现代社会权力机构的地方治理与知识传播,已呈现出显著地去中心化与网络化的结构特征(钟伟军, 2013)。政治精英不再只是自上而下垄断式地单方面传递地方知识,而是开始以地方居民更能接受与互动的模式自下而上地进行治理与思考。面对外部媒介炒作的消极意象,作为“家”的管理者,康巴什新区政府不直接发布关于地方文本信息,而是通过转发其他媒介的文本消息,实现对康巴什“家”的物质重构和事实还原。在这些转发的文本中,形式上使用了微信朋友圈、手绘漫画等时下最流行的传播载体,内容中充满了网络语言、地方语言等流行文化元素(图3<sup>⑥</sup>)。例如,在2015年6月5日“康巴什新区发布”微信号转发的4幅拟人化图片中,康巴什天朗气清的优美风景照被人性化化为“自拍照”,北京、上海等城市纷纷表示对康巴什休闲、自在工作环境的羡慕,苏州、太原、海南等城市则争相留言表达对康巴什生态环境的向往。不难发现,政府在重构康巴什“家”的形象过程中力图通过更亲民的、非正式的方式实现跨地方对话,突显“自家”独有物质条件。而蓝天、白云、绿地等生态宜居必备的自然景观则成为政府作为“管家”为家空间添置的引以为傲的“家具”。

显然,康巴什新区政府明白,与政府官员和文化精英的赞美相比,运用草根群体话语表述康巴什作为家的意义会更具效果。在本文考察的3类新媒体中,均设有“爱我康巴什”“最美康巴什人”板块,新区政府总在强调康巴什新区是鄂尔多斯市最重

要的一部分,居民对康巴什的情感充满了温暖与希望。正如,由“康巴什新区发布”转发的“鄂尔多斯发布”报道中居民张先生所述:

“我每每回到家乡,都会看到巨大的变化。尤其是康巴什的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城区里整洁宽阔的道路、现代感十足的建筑、妆点城市的绿荫和雕塑,这一切的一切都让我这个游子感到澎湃……这些崭新的建筑们,承载着鄂尔多斯文明的代代传承,与一代代鄂尔多斯人的汗水与智慧密不可分<sup>⑦</sup>。”

在新区政府的重构中,康巴什是鄂尔多斯城市发展的窗口,表征了先进的城市文化空间。政府选择展示的城市景观集中代表了鄂尔多斯城市的新变化,会增强对新区的发展期许,给予新区更多的温暖与希望。毕竟只有当一个地方充满了关怀与情感,才有可能被称为“家”。政府书写的文本展示了政府管理与经营城市的方式与理念,表征了政府对康巴什进行去污名化的意图。康巴什新区政府并不对外部媒介炒作的“无家”意象进行正面驳斥,而是间接迂回地巧借流行文化与草根群体的话语从物质与情感2个方面进行意义重构,不断努力为康巴什重塑“家”的意象。

总之,表征作为意义的呈现与建构方式,被运用于以各种文本为对象的地理理想象研究中(Hones, 2008)。Massey(1995)认为,地理理想象已成为理解世界的方式,并且成为“我者”为“他者”再现世界的重要途径(林耿等, 2015)。由于文本强烈的表征与建构作用,康巴什以截然不同的“家”的意象用于外部媒介与政府的权力运作之中,被赋予了不同尺度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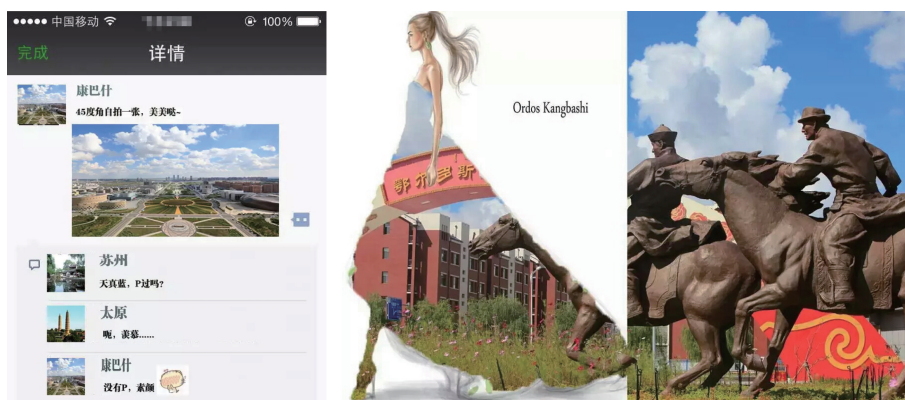


图3 政府重塑的康巴什意象

Fig.3 The image of Kangbashi New Town reconstructed by the government

⑥图片来源:康巴什新区发布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8d7b97b10102vupz.html](http://blog.sina.com.cn/s/blog_8d7b97b10102vupz.html)与微信公众号“康巴什新区发布”。

⑦资料来源:康巴什新区发布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8d7b97b10102v93d.html](http://blog.sina.com.cn/s/blog_8d7b97b10102v93d.html)。

的象征意义。

#### 4.2 非表征:新区居民的日常生活实践与情感认同

康巴什具有很强的政治属性,政府为了推动新区的建设与发展,于2008年将康巴什原24个农牧业生产合作社的土地进行征用与收储,并且将鄂尔多斯市政府、鄂尔多斯一流的幼儿园、小学及中学,从原来的东胜区迁至康巴什新区。因此,康巴什居民大多为跟随这些机构搬迁的公务员、教师等生活在康巴什主城区的城市中产阶级以及生活在康巴什移民区的转移进城农民群体。本文意图重点对外界“鬼城”话语之下的康巴什新区意象进行回应,展示“家”营建过程中的能动性,因此侧重选择生活在康巴什主城区居民的日常生活实践进行探讨。这些居民在康巴什具有全新的居住体验,因此伴随着在康巴什的日常生活,他们在康巴什“家”的营建大多经历了从陌生到认同的转变过程。不同于新区外部媒介建构与政府重塑的这2种截然不同的文本意象,居民选择以日常的生活实践与情感体验逐步使康巴什成为自己的“家”,并通过空间转换与情感边界的构建2个方面而实现。

##### 4.2.1 空间转换与“家”功能认同的培育

在民间借贷危机与不景气的煤炭市场影响下,鄂尔多斯整体商品房房价持续下跌,居民不再以置业为资产增值手段。相比于旧城区东胜,康巴什拥有更优越的居住环境与发展潜力,因而真正具有居住需求的市民越来越愿意选择在康巴什购置新房,与“鬼城”话语中“令人堪忧的经济形势”相反,康巴什居住人口正在稳步增长。以笔者重点走访的主城区珠江社区与移民区新北社区为例,珠江社区总住户3156户,入住2478户,入住率高达78.5%;新北社区总住户2016户,入住1621户,入住率高达80.4%。逐步提高的入住率本身便是对炒作“鬼城”话语的否定。

在城市快速转型的过程中,伴随着城市空间发展与演进的浪潮,流动性已然成为塑造“家”的意义的有效实践途径(杨茜好等,2015)。在此背景下,入住全新的城市空间后,康巴什居民在日常生活空间的转换与流动的实践中产生对康巴什作为家空间的功能认同。

首先,对于原本就生活在康巴什新区的农民来说,就地安置的做法使得他们经历了乡村到城市的空间转换,但由于离“家”不离土,即便是在全新的

康巴什新区营建“新家”,对于家乡发展与现代化城市的期许,使得他们仍然对未来的新生活充满了憧憬与向往。而对于本文主要探讨的公务员、教师等城市精英阶层,这类群体具有的社会、文化与经济资本,即使在完全不同的城市空间中,他们亦可以娴熟地营建自己的“新家”,并且由于长期在原本相对快速与密集的空间生活,使得他们对于公共空间与休闲生活有着极大的憧憬与向往。居民通过日常休闲游憩将家的空间范围由私人住宅空间扩展到公共空间。日常休闲游憩不仅可进行地方的营建,还可以进行家的营建,休闲游憩活动对拓展家的空间范围具有重要作用(Reid et al, 2015)。面对康巴什新区现有的31个规模与主题各异、在外部媒介看来造型绚丽奇特的公园与广场,居民在入住之初并不能完全了解与使用,但熟悉与适应周围生活后,伴随着茶余饭后的日常休闲活动,居民已经逐渐能够准确地识别社区住宅周边公共游憩空间的具体位置与官方名称,认为这些设施完善的公共空间反而是当初被动搬迁时所没有想到的惊喜,进而这些公共游憩空间中活动产生了如家一般的熟悉感与轻松感。例如,居民F的每日休闲生活就是“听着音乐在康巴什大街上走,从家里出来以后,经过乌兰木伦湖(图4a)……从乌兰木伦四号景观大桥穿过来之后,再进草原美术文化公园,有时去到政府大楼门前经过双驹广场(图4b<sup>⑧</sup>),路过草原情广场,再返回来。”这些居民心中的“家”的领域界线彼此重合但并不相同,相互交融错落地构筑了康巴什新区作为家的空间领域。在这个由城市内部空间串联而成的家空间中,居民C惊喜地形容:“感觉远离了世俗,可以让人放松下来,让心灵去飞。”这样的表述不仅客观地描绘了新区居民的休闲游憩方式,更在主观层面上展示了康巴什作为居民“家”的象征意义。

其次,主城区居民已经在“新家”与“老家”之间形成相对固定的流动方式与模式,以应对由于康巴什功能缺失造成的生活实践不便,并逐渐对各种不便显得毫不在意。流动本身就是进行社会实践感知世界的重要过程,在流动中可改变人们对于地方的看法(Adey, 2010)。虽然经过了10多年的发展,但是康巴什与周边城区相比,依然还是存在着诸多的功能缺失。因此,居民会因为走亲访友或购买商品而频繁地往返于与康巴什相邻的东胜区(25 km)

⑧图片来源:康巴什新区门户网站 <http://www.kbs.gov.cn/>。





图4 乌兰木伦湖畔与双驹广场的休闲游憩活动

Fig.4 Recreation activities in parks and squares

和伊金霍洛旗阿镇(3 km)之间。居民E直接说道：“我哇，喜欢人多热闹的地方，喜欢到处逛到处买，康巴什没有，没关系，周末我去东胜就行，去消遣。我住的这个小区礼拜天居民会出走1/3，从地下停车场就能看出来。除了去东胜，我也经常去伊旗，因为我老家在那，我父母住在那，有事没事开上车就去个啦(就去了)。”居民I也表示：“说实话，(在)康巴什(购物)毕竟可供挑选的余地少，但话又说回来，大件物品或是需要多加挑选的物品，又不是非要在康巴什买才行。开上车出个(去)买，就当是旅游了。”因此，在日常的空间转换中，新区的内部功能分区之间、新区与城市的其他区域之间实现了功能互补，居民实现了对家空间感知的尺度跃升，越来越认同新区可作为“家”空间而满足生活功能的需求。

#### 4.2.2 边界流动与“家”情感认同的展演

“家”被认为是提供隐私与遮蔽的场所。而边界就是区划空间与建构认同最有力的工具。边界并不都是篱笆、围墙或界碑等实体性符号，还包括社会性及其他非空间性要素(Power, 2009)，例如情感。面对外界对康巴什的“鬼城”炒作，居民在“去污名化”的过程中会建立“家”的情感边界进行“战术性抵抗”。也正是这种“去污名化”的过程加速了新区居民对康巴什新区经历由陌生到认同的情感转变。当面对片面宣扬康巴什鬼城认知的人，“家”的情感边界显现其抵御功能，这些人被认为是居心叵测不受欢迎的“他者”，居民会将“他者”区离于边界之外，并对“他者”所宣扬的不真实的地方想象加以辩驳，对外界的质疑与诽谤直接表现出“不欢迎”的主人姿态。

“有次我坐火车听到一个大叔在给旁边两小姑

娘不住气唠(不停地说)，说‘你们要去鄂尔多斯呀，那一定要去康巴什看看，那里晚上都没有人的啊，往单元楼里一看一户户全是阴宅’，吓得那两小姑娘大叫，当时我就恼了，直接过去拆穿他，像这样乱说的(人)以后在大街上看见也绝对赶出个(赶出去)!”

——康巴什居民M

康巴什在居民心中已经作为独立的文化空间存在，充满了家的情感意义。需要明确的是，这种家的情感认同基于居民对新区的地方依恋，但是又与地方依恋所展示的人地情感连接不同，具有显著的主体性与排他性(Ralph et al, 2011)，边界之内是“我”的“家”，“我家”不允许被“外人”随意地侵犯与污蔑(Blunt et al, 2006)。因而在面对争议时，整个鄂尔多斯市只有康巴什是他们“捍卫”的家，不允许被随意丑化。同时，Power(2009)也指出，家的边界并非是单一的、一成不变的，而会通过居民的日常生活实践而不断地建构并持续地维护家空间的舒适感。因而对家空间而言，边界并非仅仅只能分隔地方，同时也可提供交流与对话的机会(Palmer, 2004)。这一过程使得家成为与现有外部空间(an inside)相对的内部空间(an existing outside)。在家空间中，不受欢迎的部分被排除在外，而想要的部分被“主人”提炼并带到内部来(Kaika, 2004)。当面对愿意深入了解康巴什的人，居民会打开“家”的边界桎梏，表现出宽容、好客的“主人”姿态。

“真想让那些当时说康巴什是鬼城的人来再来康巴什看看，特别是那些以前拍过康巴什说是鬼城的记者，他们真的是……要知道，这里是发展变化的……如果他们愿意再来，我们欢迎，让他们现在再去拍一下(康巴什)，这里会让他们自己震撼的!”

——康巴什居民K



就是在居民情感边界的显现与消隐中,居民逐渐建立起对康巴什作为“家”的情感认同。边界的显现使得居民对新区作为家的感知更为强烈,康巴什跃升成为居民情感认同的象征空间,是他们捍卫且不容侵犯的家。康巴什作为“家”兼容并蓄,能够以更加包容的姿态接受“四方来客”各种善意的交流与批评。

## 5 结论与讨论

### 5.1 结论

本文基于表征与非表征研究框架,以鄂尔多斯市康巴什新区为例对中国城市新区作为“家”的空间身份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外部媒介与新区政府主要运用语言、图像及其带有主观色彩的表述方式以表征与建构的方式,对康巴什“家”的意象进行传播。而城市居民则主要通过日常生活的实践与体验,以非表征的方式在康巴什新区进行“家”的营建。具体而言,西方媒介针对康巴什传递了“阴暗”、“荒凉”等消极的“无家”特征,这些特征在被国内媒介与受众接收后不断地传递与放大,康巴什成为中国快速城市化不健康的城市家空间。面对“家门外”旁观者的消极建构,新区政府担起了设计师与管家的角色,巧妙地选择利用流行文化转述新区“草根群体”的话语,对康巴什“家”的形象进行重塑。康巴什被新区政府重塑为具有生态宜居特征的、承载了整个鄂尔多斯城市发展希望的、居民共

同的“家”。而生活在新区的居民则通过日常生活行为对“家”这一概念进行实践与培育,主要表现为:通过空间转换与日常流动性的协商以建构对新区的功能认同;对不同态度的外界群体进行“战术性”反击,在情感边界的消隐与显现中建构对新区的情感认同。伴随着新区、城市、国家不同尺度的转换,新区家空间的身份建构、重塑与实践成为密不可分整体,而正是这持续循环的过程,最终塑造了康巴什多重的充满矛盾意义的“家”的形象,并持续不断被不同主体相协调(图5)。在后现代社会的文化情境中,人们对空间的认知逐渐从刻板僵化的物质性平台与容器转变为现代社会关系的建构、解构与重塑(钱俊希等, 2015)。地方政府、外部媒介以及新区居民等不同行动者对于康巴什新区的“家”的营建方式虽然不尽相同,但不可否认的是,不同行动者在选择行动方式对康巴什进行“家”的协商时依然各有侧重。研究以表征与非表征为研究视角,探查现阶段康巴什“家”的协调状态与发展现状,剖析不同行动者各自有所侧重的行动方式,对于明晰目前中国城市新区作为“家”的意义生产与真实存在,具有重要的意义与作用。

### 5.2 讨论

本文主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对“家”的地理学特征与影响进行本土化研究是未来的研究趋势(白凯等, 2014)。然而在中国,“家”的地理学研究却长期忽略将除家庭之外更大的社会文化空间维度作为家空间进行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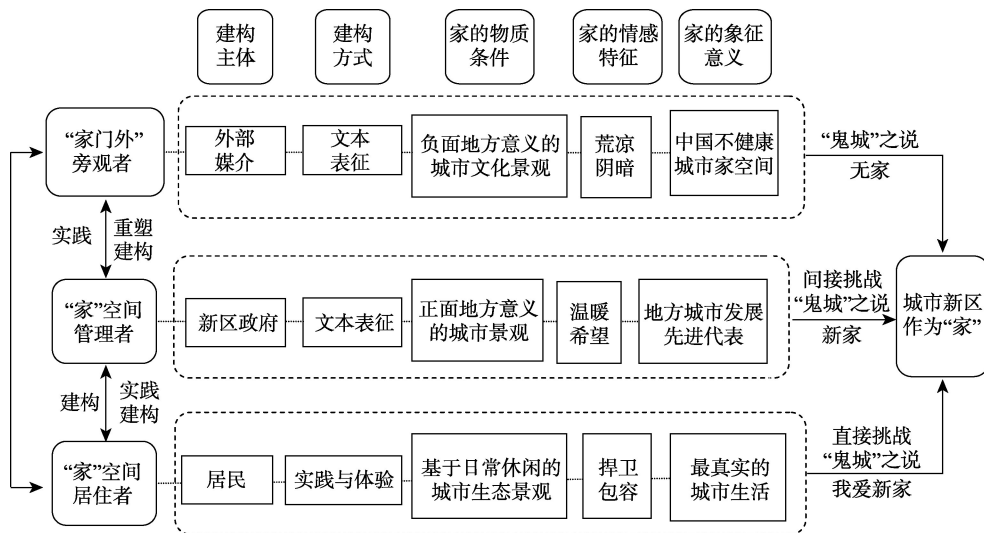


图5 城市新区作为“家”空间的协商机制

Fig.5 The negotiation dynamics of new urban district as "home" in cities

究。要实现不同尺度的“家”的跃升,就需要将小尺度的“家庭”镶嵌到大尺度的“家园”之中,那么符合社会文化本底的道德标准将有助于实现这种尺度转换的空间表征过程(周尚意等, 2015)。在中国当下社会文化的大背景下,家的尺度范畴并不囿于“家庭”这样的微观尺度,“家乡”“国家”所代表的中宏观地理尺度亦可以包涵于家的意义。同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文化道德与情怀亦有助于将家的边界拓展到小家庭以外的空间(Su, 2014)。本文将城市新区纳入“家”的研究维度,是对以“家庭与家族”为出发点的传统“家”的地理学研究的扩展与深化。当一个城市开始成为居民的“家园”时,那么萦绕其中的“乡愁”与“城伤”自会迎刃而解。

其次,验证并丰富了批判“家”的地理学(critical geographies of home)研究理论与视角。批判“家”的地理学提倡关注“家”所具备的两层意涵。第一层意涵是基于空间化(spatialized)的理解,认为家是基于特殊地理位置(site)的地方(place)与空间想象(spatial imaginary);第二层意涵是基于政治化(political)的理解,强调家的营建过程中隐含的压迫与反抗。就家的空间性而言,本文发现“家”的确可以存在于文本的表征与想象之中,但同时也可排除文本根植于日常的生活实践与真情实感之中(Brickell, 2012)。就“家”的政治性而言,以往研究主要集中于针对某一类固定群体(如同性恋、无家可归者等边缘群体)讨论家中的排斥与反抗(Daya, 2013),而本文较为全面地综合讨论了不同主体对同一个尺度的“家”的感知与认同,有利于更为直接地通过对比展示不同主体在建构“家”的过程中所呈现出的迥异的方式与特征。

最后,从实践层面来讲,本文关于外部媒介对中国城市新区形象建构的分析表明,媒介并不总是会作为家的营建工具(Bonini, 2011),也会成为家的消解工具。在实践中应理性解读西方话语体系所建构的媒介信息,不应盲目附和。目前,中国许多城市新区的确存在土地盲目扩张、楼盘供需不平衡问题(姚士谋等, 2014),在后续的城市新区建设与发展过程中应合理进行新区规划并科学地逐步推进产城融合。但面对已经建成或尚在建设的新区理应发展、辩证地品评,给予更多地包容与期许。新区并非就是“无家”的地方,更不应将其等同于“鬼城”。本文中康巴什居民在新区的日常生活与情感

的展示就是对“鬼城”之说最好的挑战。希望后续研究以更多不同类型的城市新区为案例地,进一步对城市新区作为家空间的建构进行探讨。

##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安宁, 朱竄. 2015. “东突暴恐”事件的批判地缘政治分析[J]. 地理学报, 70(10): 1650-1663. [An N, Zhu H. 2015. A critical geopolitical analysis of "East Turkistan violence and terrorism" activities in China[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70(10): 1650-1663.]
- 白凯, 周尚意, 吕洋洋. 2014. 社会文化地理学在中国近10年的进展[J]. 地理学报, 69(8): 1190-1206. [Bai K, Zhou S Y, Lv Y Y. 2014. The progress of social cultural geography in China in recent 10 years[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69(8): 1190-1206.]
- 封丹, 李鹏, 朱竄. 2015. 国外“家”的地理学研究进展及启示[J]. 地理科学进展, 34(7): 809-817. [Feng D, Li P, Zhu H. 2015. Progress in geographic studies on "home" and implications for China[J]. Progress in Geography, 34(7): 809-817.]
- 李樊, 李欧. 2008. “表征”: 作为文化符号意义的社会学反思[J]. 长春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 92-94. [Li F, Li O. 2008. "Biaozheng": Zuowei wenhua fuhao yiyi de shehuixue fansi[J]. Journal of Changchu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2): 92-94.]
- 李郁, 李灵犀. 2006. 国内城市新区开发的政府与市场的互动机制与模式: 以广州琶洲地区开发为例[J]. 热带地理, 26(3): 243-247. [Li X, Li L X. 2006. The mechanism and pattern of mutual promotion between government and market in the development of new urban district: A case study of Pazhou in Guangzhou[J]. Tropical Geography, 26(3): 243-247.]
- 林耿, 潘恺峰. 2015. 地理想象: 主客之镜像与建构[J]. 地理科学, 35(2): 137-143. [Lin G, Pan K F. 2015. Geographical imagination: The mirroring construction between the objective and subjective bodies[J].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35(2): 137-143.]
- 刘云刚, 殷冠文. 2010. 地方政府主导的土建城市化: 以鹤壁市为例[J]. 地理科学进展, 29(7): 887-896. [Liu Y G, Yin G W. 2010. Local government-oriented city making in inland China: A case study of Hebi, a mining city[J]. Progress in Geography, 29(7): 887-896.]
- 米歇尔·福柯. 1998. 知识考古学[M]. 谢强, 马月,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Foucault M. 1998.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M]. Xie Q, Ma Y, Trans.. Beijing, China: SDX Joint Publishing Press.]
- 钱俊希, 朱竄. 2015. 新文化地理学的理论统一性与话题多样性[J]. 地理研究, 34(3): 422-436. [Qian J X, Zhu H. 2015. Theoretical unity and thematic diversity in new cultural ge-



- ography[J]. *Geographical Research*, 34(3): 422-436.]
- 斯图尔特·霍尔. 2003. 表征: 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M]. 徐亮, 陆兴华,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Stuart H. 2003. *Representation: Cultural representations and signifying practices* [M]. Xu L, Lu X H, Trans.. Beijing, China: The Commercial Press.]
- 杨茜好, 朱竑. 2015. 西方人文地理学的“流动性”研究进展与启示[J].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47(2): 1-11. [Yang X H, Zhu H. 2015. Progress and revelation of researches on the anglophone geography of mobilities[J]. *Journal of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Natural Science Edition*, 47(2): 1-11.]
- 姚士谋, 张平宇, 余成, 等. 2014. 中国新型城镇化理论与实践问题[J]. 地理科学, 34(6): 641-647. [Yao S M, Zhang P Y, Yu C, et al. 2014.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new urbanization in China[J].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34(6): 641-647.]
- 张梅, 李厚羿. 2013. 空间、知识与权力: 福柯社会批判的空间转向[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3): 113-118. [Zhang M, Li H Y. 2013. Kongjian, zhishi yu quanli: Fuke shehui pipan de kongjian zhuanxiang[J]. *Marxism & Reality*, (3): 113-118.]
- 钟伟军. 2013. 公共舆论危机中的地方政府微博回应与网络沟通: 基于深圳“5.26 飙车事件”的个案分析[J]. 公共管理学报, 10(1): 31-42. [Zhong W J. 2013. The micro-blogging response and networks communication of local government in public opinion crisis: Based on the case of 5.26 drag racing event in Shenzhen[J]. *Journal of Public Management*, 10(1): 31-42.]
- 周尚意, 成志芬. 2015. 关于“乡愁”的空间道德和地方道德评价[J]. 人文地理, 30(6): 1-6. [Zhou S Y, Cheng Z F. 2015. On the morality of nostalgia[J]. *Human Geography*, 30(6): 1-6.]
- 朱竑, 高权. 2015. 西方地理学“情感转向”与情感地理学研究述评[J]. 地理研究, 34(7): 1394-1406. [Zhu H, Gao Q. 2015. Review on "emotional turn" and emotional geographies in recent western geography[J]. *Geographical Research*, 34(7): 1394-1406.]
- 朱孟珏, 周春山. 2013. 国内外城市新区发展理论研究进展[J]. 热带地理, 33(3): 363-372. [Zhu M J, Zhou C S. 2013. Progress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new urban district development theories[J]. *Tropical Geography*, 33(3): 363-372.]
- Andrews G J, Grenier A M. 2015. 老年人移动构成的时空: 老龄化地理学中非表征理论的引入[J]. 地理科学进展, 34(12): 1512-1534. [Andrews G J, Grenier A M. 2015. Ageing movement as space-time: Introducing non-representational theory to the geography of ageing[J]. *Progress in Geography*, 34(12): 1512-1534.]
- Adey P. 2010. *Mobility*[M]. Abingdon, UK: Routledge: 157-159.
- Ahmet A. 2013. Home sites: The location(s) of 'home' for young men[J]. *Urban Studies*, 50(3): 621-634.
- Badgett M V L, Folbre N. 1999. Assigning care: Gender norms and economic outcomes[J]. *International Labour Review*, 138(3): 311-326.
- Blunt A. 2005. *Cultural geography: Cultural geographies of home*[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9(4): 505-515.
- Blunt A, Dowling R. 2006. *Home*[M]. Abingdon, UK: Routledge.
- Bonini T. 2011. The media as 'home-making' tools: Life story of a Filipino migrant in Milan[J]. *Media, Culture & Society*, 33(6): 869-883.
- Brickell K. 2012. 'Mapping' and 'doing' critical geographies of home[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36(2): 225-244.
- Burton G. 2005. *Media and society: Critical perspectives*[M]. Berkshire, UK: Open University Press.
- Cadman L. 2009. Nonrepresentational theory/nonrepresentational geographies[M]//Kitchin R, Thrift N.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human geography*. London, UK: Elsevier: 456-463.
- Cloutier-Fisher D, Harvey J. 2009. Home beyond the house: Experiences of place in an evolving retirement community [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29(2): 246-255.
- Daya S, Wilkins N. 2013. The body, the shelter, and the shebeen: An affective geography of homelessness in South Africa[J]. *Cultural Geographies*, 20(3): 357-378.
- Dittmer J. 2010. *Popular culture, geopolitics, and identity*[M]. Plymouth, UK: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 Hones S. 2008. Text as it happens: Literary geography[J]. *Geography Compass*, 2(5): 1301-1317.
- Kaika M. 2004. Interrogating the geographies of the familiar: Domesticating nature and constructing the autonomy of the modern hom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8(2): 265-286.
- Lagerqvist M. 2014. The importance of an old rural cottage: Media represent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national idyll in post-war Sweden[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36: 33-41.
- Lorimer H. 2005. Cultural geography: The busyness of being 'more-than-representational'[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9(1): 83-94.
- Massey D. 1995. *Imagining the world*[C]//Allen J, Massey D. *Geographical worlds*.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oore J. 2000. Placing home in context[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20(3): 207-218.
- Morrison C A. 2012. Heterosexuality and home: Intimacies of space and spaces of touch[J]. *Emotion, Space and Society*, 5(1): 10-18.
- Pain R. 2009. Globalized fear? Towards an emotional geopolitics.

- tics[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33(4): 466-486.
- Palmer L. 2004. Bushwalking in Kakadu: A study of cultural borderlands[J]. *Social & Cultural Geography*, 5(1): 109-127.
- Pinkerton A, Benwel M. 2014. Rethinking popular geopolitics in the Falklands/Malvinas sovereignty dispute: Creative diplomacy and citizen statecraft[J]. *Political Geography*, 38(1): 12-22.
- Power E R. 2008. Furry families: Making a human-dog family through home[J]. *Social & Cultural Geography*, 9(5): 535-555.
- Power E R. 2009. Border-processes and homemaking: Encounters with possums in suburban Australian homes[J]. *Cultural Geographies*, 16(1): 29-54.
- Ralph D, Staeheli L A. 2011. Home and migration: Mobilities, belongings and identities[J]. *Geography Compass*, 5(7): 517-530.
- Reid K, Beilin R. 2015. Making the landscape "home": Narratives of bushfire and place in Australia[J]. *Geoforum*, 58: 95-103.
- Reid L, Smith N. 1993. John Wayne meets Donald trump: The lower east side as wild wild west[M]//Kearns G, Philo C. *Selling places: The city as cultural capital, past and present*. Oxford, UK: Pergamon, 193-209.
- Su X B. 2014. Tourism, modernity and the consumption of home in China[J].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39(1): 50-61.
- Thrift N. 1996. *Spatial formations*[M]. London, UK: Sage.
- Thrift N. 2008. *Non-representational theory: Space, politics, affect*[M]. London, UK: Routledge.
- Tolia- Kelly D P. 2004. Materializing post-colonial geographies: Examining the textural landscapes of migration in the South Asian home[J]. *Geoforum*, 35(6): 675-688.
- Walters T, Carr N. 2015. Second homes as sites for the consumption of luxury[J]. *Tourism and Hospitality Research*, 15(2): 130-141.

## The representation and practice of new urban district-as-home in China: A case study of Kangbashi New Town, Ordos

YIN Duo, QIAN Junxi, ZHU Hong\*

(Centre for Cultural Industry and Cultural Geography,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1, China)

**Abstract:** Recent cultural geographical research on the home reflects engagements not only with the material form of residential space but also the embodied, emotional and performative nature of home in different geographical scales. This article takes Kangbashi, a typical new town in Ordos, as a case area to analyze the contradictory representa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new town" and the ways in which different social actors construct, practice, and negotiate with the new town's subjective identity as home. The result indicates that: On the one hand, the discourse of popular media outside the Kangbashi New Town, BBC and Times in particular, describes it as a "Ghost City", a weird and unhealthy home space with largely the quality of desolated and abandoned landscape. In contrast, the local government endeavors to re-shape the image of Kangbashi New Town as a vigorous and livable space of the city that is filled with ecological and cultural landscape. On the other hand, residents living in Kangbashi New Town tend to negotiate the meanings of home through their own everyday practices beyond the social representation and authorized discourses. First, daily life mobility enables residents to overcome the spatial constraints of the new town, permits them to break out the social isolation and integrate into the broad urban society. Second, local residents' identity of city-as-home is gradually fostered through re-mapping of the emotional boundary of their living place. In this sense, local residents are not passive recipients of the representation imposed by either the government or the media. We argue that home making is a dynamic negotiation process instead of a fixed and dominant one, which opens a diversified and contradictory image for continuous negotiation by different social actors in everyday life. We hope our findings can provide some insights for further studies on critical geographies of home, and provides some useful ideas on the development of new town research in China.

**Key words:** new town; "ghost town" and home; representation; non-representation; Kangbashi new town, Ordos